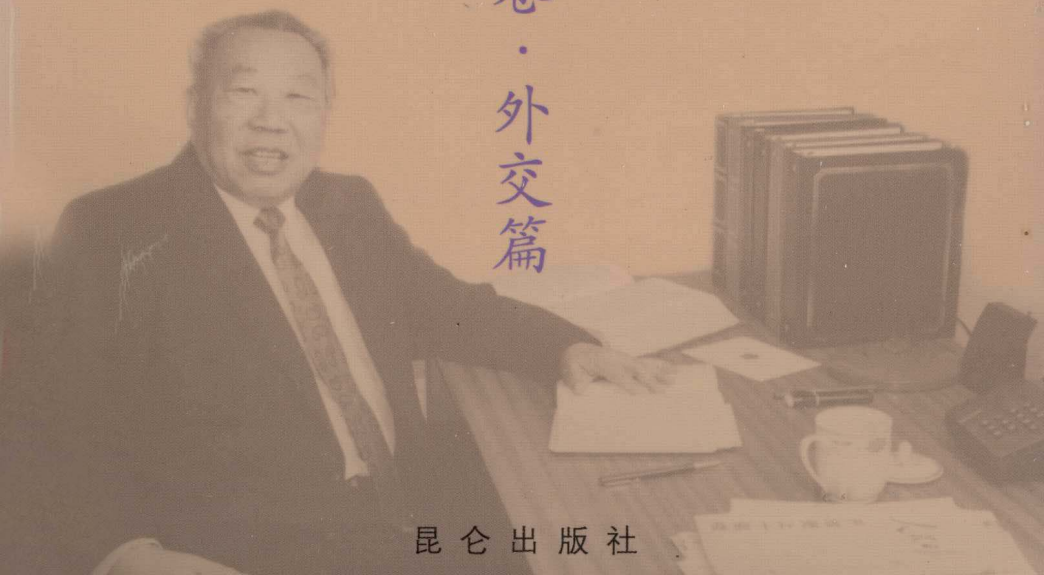




李连庆 文集

第五卷
·
外交篇



昆仑出版社

李连庆文集

第五卷

(外交篇)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连庆文集·外交篇/李连庆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 11

ISBN 7-80040-659-8

I. 李… II. 李… III. ①李连庆-文集②外交-中国-文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4865 号

书 名: 李连庆文集 第五卷 外交篇

作 者: 李连庆

责任编辑: 路 己 苏 琪 (特邀)

装帧设计: 陈亦逊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478 千字

印 张: 16.125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59-8/I·489

定 价: 230.00 元 (1-6 卷)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中国外交演义序	(1)
世界外交家传序	(8)
中国外交辉煌五十年	(10)
论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26)
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和政策	(40)
酒与外交	(47)
茶与文化和外交	(51)
外交官与新闻界	(57)
冷暖岁月	(60)
答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圆城次寺郎先生	(388)
同大平首相、大来外相谈话	(390)
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访问日本报告	(394)
我与拉·甘地总理的交往	(401)
与印度领导人的交往	(405)
在庆祝中印两国建交三十五周年宴会上的讲话	(417)
在印中友协德里分会庆祝中印建交三十五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419)
在记者吹风会上的讲话	(421)

给英迪拉·甘地纪念委员会信	(426)
《印度援华医疗队图片展览》贺词	(427)
今日中国	(428)
中国经济现代化及其影响	(437)
在西孟邦友协会议上的讲话	(444)
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	(446)
在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451)
在印中友好协会上纪念森德拉尔诞辰一百周年 大会上的致词	(454)
在印中协会上纪念森德拉尔诞辰大会上的讲话	(456)
在全印制造商协会上的讲演	(458)
在不丹外长宴会上的讲话	(462)
在北方邦友协代表会上讲话	(464)
共同努力，促进中印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466)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状况	(469)
中印两国友好的历史	(474)
花园城市——新德里	(484)
在悼念巴苏大夫集会上的讲话	(488)
大使工作种种	(490)
我是怎样做外交工作的	(501)
做一个合格的外交干部	(503)

中国外交演义序

说起外交，自古有之。

外交一词在中国周朝春秋时代即已出现，如《墨子》中说：“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国语》中说：“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这里所说的外交乃是“人臣私见诸侯”，或指与朋友，与外人的交际，并非今日的“外交”含义。

英国外交家哈罗·尼科尔森认为：“如果把外交看做是处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关系正常行业，那它早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了。”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已形成了外交惯例，即送信的谈判者享有一般战士所没有的特权和豁免，其人身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外交活动是在国家产生以后，随着国家的对外交往发展而发展的。外交一词的新含义来源于希腊语，用罗马文拼写为“diploma”。它的原意是指古希腊君主派遣使节时所颁发的证明其身份的“双重折叠”的特许证书，或这种证书的副本。这个词后来转义为外交。英语为“diplomacy”，法语为“diplomatie”，俄语为“дипломатия”等等。

对于外交的词义，中外学者论述颇多，观点各异，众说纷纭。中国《辞海》上说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明

确指出，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中国和世界外交史是很悠久的。

中国在公元前 700 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并在战国时代确立封建制的大转变时期，是举世公认的外交大舞台。那时列国称雄，互相争斗，彼此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外交斗争相当尖锐，出现了许多全凭三寸不烂之舌的说客、军师、幕僚。他们都各为其主施展出优秀的外交才干，甚至不少人不辱君命，临危不惧，壮烈献身。苏秦、张仪的“合纵”、“联横”以及“远交近攻”等思想，都体现了当时列国间重要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斗争。秦朝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经过朝鲜到达日本，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汉代张骞、班超、班固等出使西域，开创了中外交往的新纪元。三国时期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和“舌战群儒”、“七擒七纵”等事例，无不生动地表现了他杰出的外交战略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唐朝玄奘、东晋法显不仅是高僧，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外交官和光荣的使节。元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数度访问了印度支那、马六甲、马来群岛、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印度洋沿岸地区、阿拉伯、非洲等 37 个国家。他率领的船队多达 200 多艘，2.7 万多人，他是打开中国到红海及东非航道的第一人，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 87 年。

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等国家亦都早已存在悠久的外交史。罗马帝国征服北非的迦太基和马其顿帝国，建立了地中海霸权。它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处理境内的外国人问题。为此还制定了《万民法》。《万民法》规定了外国人与罗马人一整套法律体系。这是罗马人对外交的一大贡献。

到了中世纪（公元 5 世纪），在原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法兰克王国、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这时候的外交掌握在封建国王手中，外交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到公元 768—814 年，法兰克王国逐渐吞并了其他国家，建立了囊括西欧的查理曼帝国。从查理曼帝国时

代起，欧洲的外交具有二元性质，即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教堂的权势从公元 8 世纪以来到 11 世纪日益扩大，外交的中心大有由皇帝移至教廷的趋势。

公元 843 年，查理曼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中三个法兰克王国，奠定了现代法、德、意三国的基础。这时封建割据加强，王权削弱，出现了私人战争和私人外交权。封建领主各霸一方，兼并土地的战争不断，国家的疆界不固定，国家的领土随着国王和领主之间的战争或婚姻关系的不断发生变化，加上拜占庭外交风格通过威尼斯传到欧洲，使得中世纪的外交具有国家关系概念不清、风格狡诈的性质。

公元 1 世纪至 13 世纪中叶，罗马教廷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教廷利用神权压服西欧各国服从教皇，并向各国派出教皇使节和教廷使节。从 1096 年至 1270 年组织了七次十字军远征，提高了教皇的权威。到了 14—15 世纪，教廷势力削弱，王权兴起。国王为了加强自己国家的实力，便借助于武力和外交两种手段，进行统治。

16 世纪末，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提出了国家主权思想，以对抗教皇的神权。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只能有一个统治者，一个领主。国家主权就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一国的君主可以绝对地、完全支配人们的一切权力和整个国家，这样一国的外交必须受君主的绝对支配。

荷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格劳秀斯也得出国家主权的思想。他认为，主权即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国家主权者是国家的本身，它的具体体现是君主或少数人。格劳秀斯的国家主权思想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要求。

中世纪外交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建立了常驻使节。16 世纪初，威尼斯共和国在伦敦、维也纳、巴黎、马德里、罗马派遣了常驻代表，英、法也在 16 世纪向其他国家派出常驻代表、常驻代表除办理国家之间的交涉外，还担负着在驻在国搜集情报等任务。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以前国家并存的新时代的开始，使 18 世纪君主制国家的贵族王朝外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反对君主制外交，提出

了“民族至上”、“国家利益至上”、“主权在民”的原则。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主张各民族之间建立和平关系，反对为争夺王位、扩大王朝领土而进行无休止的王朝战争。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认为“为了一个国君在判断时发生错误而使两个民族毁灭，这是愚蠢和野蛮的”。也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又进一步提出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口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又提出“独立自主”的观念，他认为“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高贵的名誉”。

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追求超额利润，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先后执行炮舰外交政策，称霸海上，进行侵略和掠夺，成为强权即公理的海盗外交的典型。日本、沙皇俄国也亦步亦趋推行侵略政策。他们这种武力和外交行动的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后来居上，臭名昭彰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等对外主张，无不为其本国的私利服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充满着法西斯的外交思想。戈培尔的“谎话的重复就是真理”，更露骨地表明了法西斯外交的欺骗性。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外交极端的自私和唯利是图。

由此可见，阶级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正如资产阶级外交家所总结的名言和奉行的政策那样：“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外交的性质和任务都是为各国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也同样跳不出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圈子。

西方国家的外交惯例、形式和技巧，逐渐传到了东方国家。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时，东方古老文明的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仍处在封建主义社会，实行君主外交，国王决定一切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中国自明朝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外国没有多少交往。

但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及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执行的是屈辱的外交，正如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的外交》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 100 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直到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民主国家，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新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在外交上的许多创造和提出许多的外交原则，特别是周恩来创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世界普遍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惟一的准则。

《中国外交演义》所讲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中国外交史。准确地说，中国与外国有正式的国家与国家的外交关系乃是鸦片战争之后，在那以前同外国交往当然也算中外关系的历史，但早期的中外关系和近代的中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中外之间的来往并非经常性，时断时疏；第二，当时中国是具有高度文化的强盛国家，而所接触来往的多半是比中国落后的亚非国家，主要进行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如著名的丝绸之路；第三，中国人出去的或外国人来中国的大都属于个人活动，并不代表国家。所以，早期的中外交往和近代的中外关系是两回事。

自从 15 世纪末欧洲新航路发现后，中外关系开始和以前大有不同，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对外关系上占了重要地位，它们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力谋向外侵略，和平的商业文化交流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盗式的侵略所代替。最早是葡萄牙人在明朝正德年间来中国的广州、漳州、泉州和宁波等地做生意，他们的行径是“剽劫行旅”、“掠夺良民”、“火铳横行”、“烦岁犯扰”。明嘉靖十四年（1535），葡人贿赂了中国官吏，获准在澳门停船贸易，以后要求住在岸上，最初他们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纳贿每年 500 银，到 1573 年海道受贿事被揭发，才将贿金改为地租。但澳门仍由中国行使主权，鸦片战争

后，葡人乘中国战败机会，于1849年自行宣告澳门为自由港，把中国海关逐出澳门，并停止对中国交纳地租，中国在澳门已不能行使主权。1887年3月26日《中葡会议草约》规定中国批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

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美国人相继来华，这时主要还是进行商业贸易与文化宗教的侵入，仍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但是这对以后的中外关系有不少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轰开了闭关封锁的中国，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俄国也在北方大肆侵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怀有更大的野心，不断发动侵略，企图独占中国。伴随战事的失败，在外交上中国也不断失利，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洗雪了国耻，外交上也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外交演义》是用演义的形式写的，也就是说不同于像《史记》等二十四史那样作为正史。演义有传说，有故事，虽然基本上以史实为依据的，但在情节上有虚构，有作者的想像和创作。就如同《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志》一样。《三国演义》里有不少虚构的东西，譬如说，刘备三顾茅庐，写得非常生动、感人，有口皆碑，但在《三国志》中并无三顾茅庐这件事，只是刘备派了关云长将诸葛亮请到汉营。

古人云：“读史可知兴亡，对镜可正衣冠。”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一，通过它可以学到许多外交知识，了解我们祖国的兴衰荣辱，了解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外交上蒙受多少耻辱，受了多少欺侮，也有不少的爱国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同敌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上的节节胜利，辉煌成就，使我们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自豪，提高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第二，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人们对外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使我们懂得外交工作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促使我们更好地从事外交工作。第三，可以古为今用，从丰富的外交斗争史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提高我们的外交工作水平。

我们这套《中国外交演义》，材料丰富，情节生动，文字流畅，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外交史书，相信它的出版对广大读者定会有所教益的。

世界外交家传序

受到世人敬仰的伟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曾经明确指出，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关系这个形式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和谋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它总是受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它的国内政策需要的制约，并为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因此，外交政策是国家政策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键环节之一。各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社会制度来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例如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霸权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保卫世界和平；帝国主义国家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到处伸手，干涉别国的内政，谋取霸权地位和利己之利；民族主义国家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奉行的是和平中立政策或不结盟政策。

但是不管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都是由本国统治阶级来制定和执行的。由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驻外使节，通过访问、谈判、交涉、发表声明、照会、备忘录、说帖、签订条约、协定、公报、参加国际会议等形式来进行的。其中主持日常外交事务的外交部长则是重要人物，许多外交政策、方针、重大的外交交涉和重要的外交活动，都是由他或由他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驻外使馆向元首、总理提出建议或亲自决定并执行。

一个外交家的素质、智慧、知识、才能、风度如何，常常决定一

个国家外交的成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策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我们编写的《世界外交家传记》丛书，其目的就是向读者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介绍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望的外交家，读者可以从他们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知识技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了解有关各国外交来充实我们自己。

我们这套丛书，材料丰富，情节动人，文字通顺，有很强的可读性，相信它的出版对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和广大读者有所借鉴、参考和帮助。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外交辉煌五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在一个金色时节，我奉调到外交部，转瞬之间已近 50 年了。

在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自参与的一部分外交斗争和外交活动中，50 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巨大的胜利，由晚清、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外交，屡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变为挺立世界的外交大国，不仅有力地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独立自由、安全，而且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伸张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擎天支柱，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产生巨大影响。现在用我的拙笔作一简要的回忆。

50 年前，金秋时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外长名义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反应复杂多样，社会主义国家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外交关系；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资本主义国家如瑞典、瑞士、丹麦、芬兰等国愿意承认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有些国家对国民党集团的态度一时还不明朗，有的国家如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既想同中国建交，又不愿完全断绝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甚至在某些场合站到国民党集团一边。美国则公开继续支持国民党集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根据上述不同

的情况，中国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自己的席位，并将各国管辖地区的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早在建国之前，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奠基者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其中包括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了一篇精彩的阐述新中国外交的讲话。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的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还没有开始。”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也要同样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即“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周恩来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又说：“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

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应该加倍谨慎。”“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从此，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成就辉煌，影响巨大。

新中国成立和中苏建交不久，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于1950年1月9日先后率领代表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经过双方多次友好协商，很快达成协议，于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给予中国长期经济贷款协定，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签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段时期内对我们国家有着重大的意义。其一，正如毛泽东说的：“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有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周恩来也说：“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其二，条约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密约，以及后来1954年赫鲁晓夫等在访华期间主动表示将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归还中国，废除1950年签订的秘密的“补充协定”，从而苏联放弃了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其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仅使得中苏关系全面发展，中国获得苏联的巨大援助，使得中国经济较快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一些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遵照毛泽东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思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如接管了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兵营、内河航行和海关以及一切不